

博物学经典译丛
NH 薛晓源 主编

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

〔德〕玛利亚·西比拉·梅里安◎绘著 郑颖◎编译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博物学经典译丛 薛晓源◎主编

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

【德】玛利亚·西比拉·梅里安 绘著

郑颖 编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 / (德) 梅里安绘著; 郑颖编
译. —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16. 2

(博物学经典译丛)

ISBN 978 - 7 - 200 - 11524 - 6

I. ①苏… II. ①梅… ②郑… III. ①昆虫—图谱
IV. ①Q96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2544 号

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

SULINAN KUNCHONG BIAN TAI TUPU

(德) 梅里安 绘著

郑颖 编译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
北京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12.75印张 114千字

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11524 - 6

定价: 6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玛利亚·西比拉·梅里安

(Maria Sibylla Merian , 1647—1717)

德国伟大的博物学家、插图艺术家。梅里安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铜版雕刻家和出版商，他知识渊博，还被誉为德国的昆虫学之父。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去世了，继父是一个写生画家。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熏陶下，梅里安从小就痴迷于蝴蝶和花朵，捕捉昆虫以仔细观察它们。13岁时，玛丽亚就创作了一本昆虫和植物的素描与水彩画册。她的早期作品于1679年和1683年先后被集结出版，这就是《新花卉图鉴》和《不可思议的毛虫变态和奇妙的植物营养》。梅里安的花草画，极其注重色彩的明暗过渡以及对光影的把握；在协调的画面布局下，无论是表现单枝花卉的臻细精巧，还是花卉与周边虫鸟世界环境的结合呈现，均力求再现自然界每一微小细节的鲜活灵动，所以它们后来被公认为是最佳的花草刻板画作品之一。

1685年，在与画家丈夫 Johann Andreas Graff 离婚后，梅里安带着两个女儿定居荷兰——当时最为强盛的海洋帝国。在这里，她接触到大量来自东印度与西印度的蝴蝶和昆虫，并深深为之着迷。1699年，52岁的梅里安和小女儿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航行，踏上了南美苏里南的土地（当时是荷兰殖民地）。两年里，她穿梭在热带雨林中，零距离地观察和调查这里的动植物生态，并描绘它们。1705年她以荷兰文和拉丁文出版了她最著名的著作《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》，这本书兼具艺术美观和科学气质，其中许多热带动植物，是当时欧洲人前所未有的。这本书迅速在各地受到赞誉，1726年又出了法文版，可惜梅里安本人1717年就去世了，去世时竟一贫如洗。

《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》一书共有60张彩色版画，原书尺寸很大，每张画的尺寸为29.5×39.5厘米，每张版画后附有一段文字说明。这些版画不仅描绘了蝴蝶和其他昆虫，也包括蛇、青蛙等其他动物，还同时描绘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、花卉或果实。在绘制蝴蝶和其他昆虫时，梅里安不仅画出了它们正飞离植物的成虫形态，还绘制了它们在一种或两种宿主植物上觅食的幼虫和蛹的形态。它们后来被誉为“美洲大地上绘出的最美作品”。

为复兴博物学做有特色的努力

刘华杰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
博物学（natural history）是一种古老的探索、理解、欣赏世界的进路（approach）。它包括对事物的记录、描述、绘画、分类、数据收集和整理以及由此形成的适合本地人生存的整套实用技艺。博物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演化出一些高雅形式，历史上相当多的博物学著作以十分精美的形式呈现。

博物学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，西方有西方的博物学，中国古代也有值得骄傲的非常特别的博物学。比较一下李汝珍的《镜花缘》与斯威夫特的《格列佛游记》也能间接大致猜到中西博物学的差异，虽然两者本身都只是文学作品。

近代以来，人们很关心西方人的观念，因为他们的一系列观念（有好有坏）深深地影响、改变了世界。于是，就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这样的学科而言，对西方的科学、哲学等颇重视。其实，不限于这样狭窄的领域，从更大的范围看，甚至从文明的层次看，也大约如此。但西方的观念并非只有科学、哲学（也未必是最好的）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和反省，如今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博物学，虽然它仍然是

西方的，但含义、特征并不同于以前在科学、哲学的名义下所见到的东西。我们戴着“眼镜”看世界，不是这副就是那副，不可能不戴。现在我们有意戴上博物学这副眼镜，以博物的视角看各种现象。

西方博物学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西方的 history 而非西方的 philosophy。有些人不理解，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科学哲学工作者为何那么关注“有点那个”的博物学？坦率点说，恰好因为博物学“肤浅”而不是“深刻”！显然，这不是说凡是 natural history 都肤浅，凡是 natural philosophy 都深刻，只是招牌给人表面的印象是这样的。不过，博物学的行事方式、知识特点也部分决定其成果的性质，natural history 得出的结果注定与 natural philosophy 得出的性质不同。前者以林奈、布丰、达尔文的工作为代表，后者以伽利略、牛顿、爱因斯坦的工作为代表。在外行看来，前者容易与琐碎、杂多经验、复杂性挂钩，后者容易与统一、理论定律、和谐性挂钩。其实，许多特征是共有的。比如，数理科学家眼中并非只有简单的物理定律和生命遗传密码，现实中照样要面对各种杂乱无章；植物分类学家眼中并非只有千奇百怪的花草树木，他们也同样洞悉了大自然的惊人秩序。我相信，所有真正的学者，不管是哪一类，在其探究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精致与和谐，而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美学体验。

形而上学的简明二分有一定道理：侧重经验事实、观察描述与实验的 history 为一方，注重第一原理、假说推演、概念思辨的 philosophy 为另一方。但是，这种清晰的二分法本身也有缺陷，割裂了 history 与 philosophy 的互相渗透，它本身是一种人为的抽象、化简。亚里士多德是全才，既研究物理学、形而上学又研究动物志；他的大弟子特奥弗拉斯特深入研究植物，还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。化

简，有收获，也是有代价的。二分法的两大类学问、探究事物的方式不应当完全对立起来，而是彼此适当竞争，在有的时候取长补短。不过，就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在乎 philosophy 进路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而言，现在强调另一面，即 history 的一面，也是一种合理的诉求。

哲学史家安斯提 (Peter R. Anstey) 认为近代早期有两种类型的博物学，一种是传统式的，一种是培根式的。第一种人们容易理解，从古代到中世纪，到近代再到现在，一直有脉络，形象还在，但第二种经常被遗忘。安斯提说近代实验哲学的“第一版”就是培根的博物学方法 (Baconian method of natural history)，也可以说培根开创了获取知识的博物学新进路 (novel approach to natural history)。培根理解的博物学，真正“博”了起来，包罗万象，这与他的实验哲学、归纳法、宏伟的知识复兴蓝图有关。在古代和培根的年代，history 的意思与现在不同，正如那时的 philosophy 与现在的理解不同一样。现在人们能够理解牛顿的主要著作为何带有 philosophy 字样，并且清楚那时 philosophy 与科学不分；其实，那时 history 与科学也不分。复数形式的 histories 显然更不是指时间，而是指对事物的各种探究及收集到的各种事实。本来这也是 history 的古义，到了培根那里，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血液循环、气泵等更新的东西。正是培根的这种博物学方法塑造了早期英格兰皇家学会的研究旨趣。波义耳也写过 *The History of the Air* 这样的作品，其中的 history 与现在讲的“历史”不是一回事；如今霍金出版畅销书 *A Brief History of Time*，难道其中的 history 只作“历史”解释？当然，我无意于计较词语的翻译，只要明白其中的含义，中文翻译成什么都无所谓，不过是一个代号。

我们今日看重并想复兴博物学，并非只着眼于它与数理科学的

对立，而是注意到其自身具有的特点，对其寄托了厚望。博物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（博物、数理、控制实验与数值模拟）之一，并且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。如今的博物也未必一定要排斥数理、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。如此这般论证博物的重要性固然可以，但还不够，还没有脱离科学主义的影子。说到底博物学不是科学范畴所能涵盖的，博物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子集。博物学中有相当多成分不属于科学，任凭怎么牵强附会、生拉硬扯也无法都还原为科学。在一些人看来，这是博物学的缺点，对此我们并不完全否认，但我们由此恰好看到了博物学的优点。成为科学，又怎么样？科学拯救不了这个世界，反而加大了世界毁灭的可能性。

博物学的最大优点在于其“自然性”。何谓自然性？指尊重自然，在自然状态下自然而然地研究事物。这里“自然状态”是相对于实验室环境而言的。“自然状态”下探究事物不同于当下主流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，它为普通公众参与博物探究敞开了大门，它同时也要求多重尺度地看世界，不能简单地把研究对象从背景中孤立出来。

“自然而然地研究”涉及研究的态度和伦理，探究事物不能过分依照人类中心论、统治阶级、男性的视角，不能过分干预大自然的演化进程。历史上的博物学是多样的，并不都满足现在我们的要求，有些也干过坏事。历史上有帝国型博物学和阿卡迪亚型博物学，还有其他一些分类。

不是所有的博物学都是我们欣赏的、要复兴的，但是的确有某些博物学是我们欣赏的（或者说想建构的），希望它延续或者复兴，对此我们深信不疑。那么，究竟哪些东西值得复兴？其实现在研究得还很初步，无法给出简明的概括。一开始，不妨思想解放一点，多了解一些西方博物学。大家一起瞧瞧它们有什么特点，哪些是好

的哪些是坏的，哪些对于我们有启发。中国出版界长期以来不成体系不自觉地引进了一批博物学著作，现在看还可以做得更主动一点、更好一些。

许多西方博物学家在我们看来有着天真的“傻劲儿”，一生专注于自己所喜欢的花草鸟兽，不惜为此耗尽精力和钱财。我们并不想鼓动所有人都这般生活，但想提醒部分年轻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。西方博物学无疑展现了多样性，可以丰富我们的认知、审美和生活。

博物画与博物学一同发展、繁荣，想想勒杜泰、梅里安、奥杜邦的绘画作品与博物学描述如何深度结合、难解难分就会同意，描绘大自然的画作与描写大自然的文字服务于同样的目的。用现在的“建构论”而非老套的“实在论”哲学来理解，它们在认真地描写对象的同时也在认真地建构对象。世人正是透过文字与画作这样的媒介来间接了解外部世界的。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，中国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？博物写作与博物绘画在此都起重要作用。当我们能够欣赏西方博物画时，反过来也有助于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美术史和文化史。中国古代绘画种类繁多，与博物学最接近的大概是花鸟画与本草插图，但在掌握着话语权的文人看来，个别者除外，它们大多被归类于“匠人画”或“院画”，境界不如“文人画”。于是，赵佶的《芙蓉锦鸡图》、谢楚芳的《乾坤生意图》和蒋廷锡的《塞外花卉六十六种》这类作品，在艺术评论家看来，可能并不很高明。民间器物上的大量博物画可能更无法入艺术史家的法眼。不过，价值观一变，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。以博物学的眼光重新看世界，不但能发现身边的鸟虫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，还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历史与文化。

多译介一些博物学著作，也有利于恢复博物学教育。2013年我为一个植物摄影展写了一段话，抄录在此：“博物学是一门早已逃脱了当下课程表的古老学问，因为按流行的标准它没有用。但是，以博物的眼光观察、理解世界，人生会更丰富、更轻松。博物学家在各地都看到了如我们一样的生命：人与草木同属于一个共同体，人不比其中任何一种植物更卑贱或更高贵；我们可以像怜爱美人一般，欣赏它们、珍惜它们。”

西方博物学不止一种类型，每一类中经典著作都不少。特奥弗拉斯特、老普林尼、格斯纳、林奈、布丰、拉马克、海克尔等人的最重要著作无一有中译本。翻译引进的道路一定非常漫长，做得太快也容易出问题。出版经典博物学著作也不是一家两家出版社能够包揽的，但各尽所能发挥特长，每家做出点特色，是可以期待的。

薛晓源先生近些年十分看好博物学，广泛收集西方博物学经典，交谈中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。晓源同时通晓哲学、艺术和出版，我相信晓源主编的博物学经典译丛有着鲜明的特色，在新时期必将实质性地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。

2015年6月21日于北京大学

发现新世界

——“博物学经典译丛”的缘起与目标

薛晓源(中央编译局研究员)

自文艺复兴以降,西方开启发现世界的旅程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麦哲伦绕好望角航行,发现非洲,欧洲探险家还远涉埃及、印度和中国。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在全球航行,寻找奇珍异宝;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登临“小猎犬号巡洋舰”奔赴异域,考察万物,促进了《物种起源》巨著的诞生;德国教育家洪堡在美洲探险,开启了生物的地理学考察;数以万计的探险家、科学家、诗人、博物学家、画家奔赴世界各地寻财问宝,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手稿、图片和文献,有游记、日记、考察报告、探险记,有精心手绘的地图、天文图像、动物植物各种图像,他们开启了西方博物学三百年的历史大幕。这三百多年气势恢宏,蔚为大观,产生无数重量级的艺术家、博物学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,促成许多文学流派、艺术流派和博物学派的诞生,大师林立、影响深远。

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、澳大利亚自然历史博物馆就珍藏数以千万计的手稿、标本、绘画和珍稀图书。随着这些博物馆近年研究成果的刊布,随着拍卖市场的勃兴,数字技术蓬勃发展,使隐蔽在全球博物馆和个人收藏的大量珍稀图书、图片、文献浮出海平面,进入大众审美视野之中,这些曾经流连在宫廷王

室、达官显贵家中的奇珍异宝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叹为观止：这些图片色彩斑斓、纤毫毕现、奇苑仙葩、栩栩如生。这些图片所描绘的动物植物在全球化、工业化的今天很多已经绝迹，还有很多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。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梳理、翻译和研究，对于我们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无疑有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这些东西对于科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、探险、旅游学、博物学、绘画学、美学无疑有着至高无上的借鉴价值。我们今天出版这些图文并茂的书籍有如斯高远的志向和目标：

展现自然的历史风貌

呈现万物的生态原样

复现科学的探索进程

再现美学的自然启蒙

本译丛将根据不同的知识维度，根据不同学科和著作的影响力度，参考广大读者的热情和关注度，由易而难，循序渐进，每年计划推出 10 种左右，希望用 10 年时间出版 100 种博物学的译作，以期能够展示西方博物学三百年来大致轮廓和发展轨迹，以飨广大读者对于博物学的殷殷之望。北京出版社欣闻我在关注和收藏西方博物学名著，力邀我分门别类、编译出版，并为此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，令人赞赏；广大译者踊跃参与，有很多著名学者牺牲了宝贵的节假日，焚膏继晷，夜以继日进行校译，那份对博物学深爱的拳拳之情，令人感佩；北大哲学系刘华杰教授，百忙之中拨冗写序推荐，令人感动；在第一辑即将付梓之际，谨致谢忱如尔！是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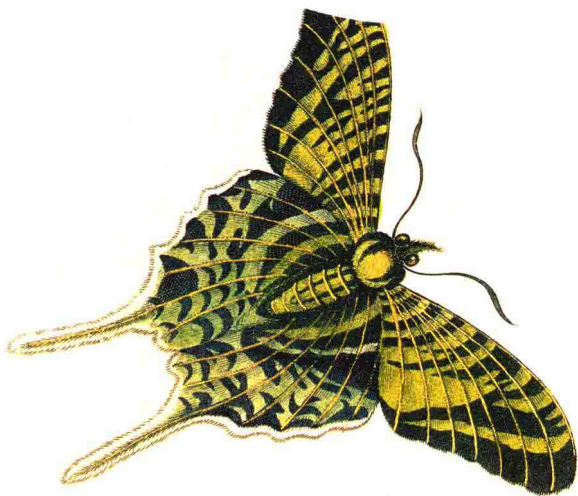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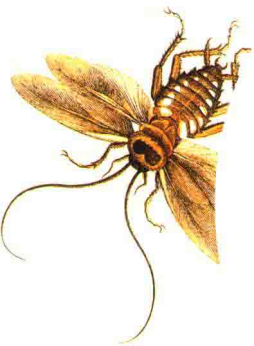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I 玛利亚·西比拉·梅里安

——与昆虫共舞的女人 / 1

II 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 / 39





S

玛利亚·西比拉·梅里安

——与昆虫共舞的女人





纸币上的梅里安

玛利亚·西比拉·梅里安（Maria Sibylla Merian，1647—1717）是17世纪德国著名昆虫学家和自然史插画家。她1705年创作的《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》是一部结合了严谨科学和优美艺术的经典之作，是昆虫史上的重大发现。不久之后，整个欧洲都知道蝴蝶不是来自泥土，而是来自毛毛虫了。梅里安的非凡勇气和大胆的求新精神鼓舞着后代探索者，她的荣耀永恒地记录在她的研究成果和画作上。迄今为止，有两种甲虫和九种蝴蝶以她的名字命名。德国1991年发行的500马克纸币，背面是梅里安所绘的毛毛虫和蒲公英，正面则是梅里安的画像。



艺术和科学的启蒙

最初的艺术熏陶

梅里安于 1647 年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。她的父亲是著名的雕刻师和出版商老马特乌斯·梅里安 (Matthäus Merian)。老梅里安曾游遍欧洲，作为画家、雕刻家、出版商和宗教思想家声名远播。他为自己撰写的游记绘制插图，其中包括东、西印度群岛的状况；他为自己的著作《德国地理》绘制蚀刻地形；他甚至为自己的作品《欧洲剧院》描绘了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景观。

1650 年，老梅里安出版了医生和博物学家约翰·约翰斯顿 (J.Johoston, 1603-1675) 的五卷本的《自然史》，作品中包含了 3000 多幅有关四足动物、鸟类、鱼类、鲸类、昆虫和蛇的绘画。不久，这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就去世了，梅里安才 3 岁，但她还是受到了父亲很大的影响，例如，梅里安经常临摹《自然史》中的一些作品作为绘画练习。

梅里安的母亲后来改嫁给雅各布·马瑞利 (Jacob Marrel)，一位花卉和静物画家，他有自己的工作室。在“郁金香狂热”年代，马瑞利忙着描绘各种不同种类的郁金香，他同时也做艺术品生意。马瑞利曾师从众多德国和荷兰的著名画师。在他的工作室里，梅里安被训练成了一名铜板雕刻的制图员。

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起始阶段，梅里安主要临摹在法兰克福继父工作室的花卉装饰图案。在梅里安的艺术家圈子里，约瑞斯·霍芬吉尔 (Joris Hoefnagel, 1542-1601) 无疑是名声较大的一位。这位来自佛兰德 (比利时北部) 的画微小图案的画家是欧洲第一个在他的图案中描绘昆虫的人。他和他的儿子雅各布也是欧洲第一批昆虫插画绘图者。在继父的工作室